



## 一、 研究動機與目的

臺灣後山<sup>1</sup>面積遼闊，自古以來即是個多族群分佈的區域，而在現在所謂的「原住民」族群尚未遷徙到後山之前，<sup>2</sup>此地原本就有非常豐富的史前文化存在，<sup>3</sup>顯示過去這裡也曾有其他先住民族分佈。這些不同的原住民族群，或許在容貌、文化、習俗、語言上有所差異，但他們共同的特徵，都是沒有文字，且沒有出現、形成國家的組織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人類歷史進入了「大航海時代」（15世紀末葉開始，舊稱「地理大發現」），由於西方國家的船隻航行經過臺灣東部海岸時，接觸到後山的風土與族群，因而將後山的地名、族社、傳說、珍貴產物（砂金）與景況推向世界史的舞臺，雖然著墨不多，但已使當時後山的部分概況及族群分佈呈現紙上。

由於後山北部河川（立霧溪或花蓮溪口）產金的訊息，使得西班牙人、荷蘭人先後進入後山查探，其中，西班牙人並未在後山正式設治；荷蘭人曾利用「地方集會」來監督、控制部分原住民族社，甚至發動戰爭懲罰不服政令的族社，<sup>4</sup>但整體而言，荷蘭政權對後山地區只是維持象徵性的統治，並未積極開發。<sup>5</sup>1662年，鄭氏王朝趕走了荷蘭人，由於統治的區域在臺灣南部，因而此地的記載模糊了起來，除了仍有採金的傳聞之外，<sup>6</sup>後山族社的名字在歷史的記載中，都消失了蹤影。

過去鄭氏王朝、清帝國及一般漢人，在稱呼臺灣原住民族群時，習慣使用「番」，日本人則改稱為「蕃」。<sup>7</sup>本文爲了書寫的流暢，及應對撰寫時空的情境，

<sup>1</sup> 此處所說的「後山」，所指的區域爲中央山脈以東，包括今宜蘭縣蘇澳鎮一部分、南澳鄉、花蓮縣、臺東縣及屏東縣獅子鄉一部分、牡丹鄉東部及滿州鄉八瑤灣以北的一部分。

<sup>2</sup> 在後山，不管是漢人或原住民族群，都非真正的「原住」族群，而是在不同時期因不同的需要，從後山以外的地方遷徙來的。

<sup>3</sup> 包括富世、花崗山、布洛灣、鹽寮、掃叭、公埔、麒麟文化、長濱文化、卑南……等遺址。

<sup>4</sup> 見康培德，《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—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》（板橋：稻鄉出版社，1999），第3-4章。

<sup>5</sup> 林玉茹，〈國家在東臺灣歷史上的角色〉，收入《東臺灣研究》5期（臺東：東臺灣研究會，2000），頁162。

<sup>6</sup> 黃叔璥，《臺海使槎錄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7），頁139-140。

<sup>7</sup> 李文良在其博士論文的〈例言〉中提到：「清代一般寫作『番』，如生番、化番、熟番、番界、番人、番地；日治時代則因日文已有『番』之漢字，爲了避免重複，添加草字頭改作『蕃』，如生蕃、熟蕃、化蕃、蕃界、蕃人、蕃地等等。」（李文良，〈帝國的山林—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1），〈例言〉）。其中的「爲了避免重複」，

在行文中對原住民族群的稱呼，仍依當時文獻記載及當局、一般人的稱呼與用字習慣，在日治之前使用「番」字，日治之後用「蕃」字，非有歧視之意，特此聲明。

到了清帝國統治臺灣前期，由於活動範圍仍以西部臺灣為主，後山地區並未正式設治，因此，只有少數冒險家及通事從事零星的探險或蕃產貿易，後山族社的族群互動或遷徙並不清楚。其間亦有漢人農民前來拓墾，但在瘴癘侵襲及國家統治力量尚未進入之前，成效相當有限，甚至在原住民族群的攻擊之下，最後完全放棄。

直到同治 13 年（1874）日軍侵臺的「牡丹社事件」之後，清政府才驚覺「化外之民」、「化外之地」治理的重要，爲了宣示對後山的領土主權，因此，以兵工分北、中、南三路開鑿番界道路，以便進入後山設施政教、實際統治，以杜絕外國勢力侵佔番地的野心。

當時清帝國的「開山撫番」，基本上是一種「武裝殖民」，除了以軍隊駐防後山之外，更以優渥的條件鼓勵漢人移往後山，並保護漢人移民的安全。由於國家力量正式進入後山，使原住民族群的生活空間受到侵擾，因而引發不悅。其間曾有數次因原住民族社的反抗而進行征討，也曾「以番制番」來平定番亂，<sup>8</sup>但由於清廷的「開山撫番」，是因應外來入侵者所做的回應，因此，在經營上並不積極，後山不過是帝國的邊陲，只要原住民族群不挑戰統治權威，或引起外國勢力的覬覦，他們仍可依循傳統的行為法則，與周遭的族群互動。而在清帝國對後山原住民族群的控制方面，對平地的控制力相對地比對中央山地的族群來得強：反抗的平地原住民族群於戰敗之後，遭遷徙或滅社的命運；山地的原住民族群則依然馳騁在山林之間，絲毫未受到衝擊。

從前原住民族群的社會中，「社」的概念比較強，並沒有「族」的概念，因此，同族間的各社可能發生征戰，而異族的鄰近番社卻可能是攻守同盟的朋友。但自明治 29 年（1896）日本帝國進入後山統治之後，整個情況有了相當大的改變。

由於這個時期國家力量積極地介入，即使臺灣山地居住著強悍的原住民族群，但卻有豐富的自然資源（樟腦、森林、礦產），爲了統治威權的確立、臺灣治安的考量，及殖民地經濟的自主，山地的開發成爲必要的政策，而如何「理蕃」（理番），就考驗了日本統治者的智慧。爲了有效地統治，並積極開發資源，政策的擬定就變得非常重要，至此，後山原住民族群的發展史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

---

改成「避免混淆」，或許會合適一些。

<sup>8</sup> 其中，最明顯曾用「以番制番」方式對付番亂的，包括阿棉納納事件（1877）、加禮宛社之役（1878）、大庄之役（1888）等。

段，命運也發生空前的改變。而在日本學者進行族群研究歸類，以及數次大規模的征討之下，「同族」<sup>9</sup>的概念被強化了起來。

過去筆者在從事碩士論文寫作，及撰寫多篇關於後山原住民族群歷史研究的短文時，發現族群之間的互動相當頻繁，如果只選擇某一支族群來探究，勢必造成遺漏或偏見，但如果拿整個後山來作為探討的課題，則範圍似乎又太過於龐大，因此，將之縮小為以「奇萊」地區做為研究的空間範圍，探究在不同時期，國家統治政策介入與不介入，積極與消極之間，對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有何影響？而族群勢力的消長，對後山族群的分佈及變遷，又扮演了何種角色？

所謂的「奇萊」，筆者是以日治時期學者所界定的範圍：北到新城，南到吳全城，東到海，西到山為界。由於族群互動的頻繁，因此，也會將鄰近的區域一併加以探討，以使研究空間的整體性不致被分割。

為何要選定「奇萊」這個區域作為研究的範圍呢？因為本區域從「大航海時代」以來，即有非常豐富的族群互動，甚至遷徙，而且有不同的外國勢力、政權在此地進行勘查、經營。清道光年間，臺灣東北部噶瑪蘭平原（蘭陽平原）的噶瑪蘭平埔族（Kavalan）遷來後山之後，即居住在奇萊地區的北部，他們為了族群的生存，必須結合奇萊平原中心的強大族社撒基拉雅族（Sakiraya，奇萊族）共同面對近山地區太魯閣族（Toroko、Taroko、Dalugu 或 Truku）的威脅，二者更曾共同出兵驅趕太魯閣族人，甚至使加灣（今秀林鄉景美村）一帶的太魯閣族人恐懼；但同光之際「開山撫番」之後，噶瑪蘭族人因駐守清軍行為不檢，及不堪其欺壓，而於光緒4年（1878）爆發了「加禮宛社之役」（「加禮宛事件」）。這場戰役除了使噶瑪蘭人及撒基拉雅人勢力崩解、遭到遷社的命運之外，也造成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的重整—南勢阿美（Ami）的勢力跨過七腳川溪，七腳川社成為南勢阿美族群中最強的族社；而太魯閣族人一躍成為後山北路最強大的族群。

再者，「開山撫番」之後於後山北、中、南形成三個重要的據點，即花蓮港、璞石閣、卑南覓，其中，花蓮港正是位於奇萊地區。日治初期，花蓮（港）並未成為獨立的行政單位，在不同時期隸屬於臺東支廳、臺東撫墾署、臺東廳等管轄。但在「理蕃」的過程中，由於後山地理形勢南北狹長，而奇萊及其周遭地區原住

---

<sup>9</sup> 關於這樣的論點，不只是筆者有而已，孫大川也曾提及類似的觀點：「臺灣原住民認同邊界的浮動，結構性的改變應當是一八九五年日據時代開始。作為已完成現代化的有效殖民政府，日本改造臺灣原住民『民族性』，是相當有效率的。經過田野調查的知識積累，日本政府成功地完成了全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識別和分族命名的工作，使原住民從原來的部落認同，逐漸轉化成更集體化的族群意識。部落意識的消弱，使原住民各族得以超越部落疆界，形成比較明確的『族類感』；『族名』的確立，也使原住民之『我族』與『他族』的界線，能有一『空間』、『地域』之外的新座標。」（孫大川，〈被迫讓渡的身體—高砂義勇隊所反映的意識構造〉，《當代》212（臺北：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5）頁126-127）。

民族的事務又相當繁雜，更是理蕃初期主要對象的所在，行政中心設在臺東（卑南），實有鞭長莫及之感，且層層命令下達時，總嫌慢了一些，因而在明治 42 年（1909）10 月 25 日〈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〉改革時，花蓮地區正式獨立設治，成為「花蓮港廳」，而廳治正是在奇萊地區。而日治前期發生的「新城事件」（1896）、「威里事件」（1906）、「七腳川社之役」（1908-1909）、「太魯閣之役」（1914）……等，也都以奇萊及其附近地區為主要的戰場。由此可見，奇萊地區在後山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值得深入探討。

而之所以選擇原住民族群作為探討的對象，是因為傳統的歷史教育中，學生們熟悉了中國朝代的歷史演變，卻對自己生長的鄉土感到陌生，有種疏離感；瞭解了漢人的拓殖經驗及豐功偉業，卻不知原住民族群亦有披荆斬棘的一面；加上過去以後山，尤其是花蓮地區為探討主題所做的歷史學術研究並不多，且多偏向以漢人為中心的歷史，或以日治時期的產業發展作為研究的主题，對原住民族群的著墨不多，甚至帶有偏見；而《花蓮縣志》做為地方歷史保存的重要文獻，卻有不少的歧誤或疏漏。

筆者出生於多族群分佈的花蓮縣，在就讀臺中東海大學之前，都一直待在水蓮求學，受這塊土地的孕育，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也希望將所學奉獻於斯」。加上筆者曾祖母為西拉雅平埔族（Siraya），身上或多或少流著原住民族的血液，因此，對這些無文字傳統的族群，深覺有責任為他們保存歷史。筆者希望透過這個研究，使大家思考國家力量對原住民族群所造成的歷史變遷，並進而充實後山奇萊地區歷史的空白。而探討的時間斷限，乃自晚清「牡丹社事件」到日本統治時期結束（1874-1945），因為這段時期國家力量因應不同的需要而進入奇萊地區，並且設立統治機構，正式治理及征伐、教化原住民族群，藉由這兩個時期國家力量介入及統治的探討，可以比較不同國家勢力進入，對原住民族群所產生的衝擊與歷史變遷。

## 二、 研究方法與大綱

在研究方法上，本研究首重資料之蒐羅及分析，必要時輔助以田野調查。<sup>10</sup>由於過去關於奇萊及其周遭地區的文獻記載，各時期資料豐富、貧乏不一，且相當分散，加上有不少歧異之處，因此，在引用時必須多加注意、小心考證，以免有疏漏或錯誤之處，而導致錯引資料、誤導讀者。而在研究內容方面，將從不同時期、不同統治當局的施政，探討其對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影響，及其所造成

---

<sup>10</sup> 筆者曾多次與花蓮地區考古專家，暨花蓮縣多所國小鄉土教材館館長王天送先生共同進行調查，以釐清部分史事及考古發生的地點。

的變遷。

而在研究中，首先要探究的是「奇萊地區的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群」。區域史的研究，首先必須界定研究的區域範圍，並瞭解區域空間的自然環境，以便進一步探討其間人群活動與空間環境的關係，如此方可掌握往後鋪陳歷史時的空間感；接著探討奇萊地區及其周遭的原住民族群。後山奇萊地區，自古以來就是個多族群分佈的區域，從文獻與傳說中，可見到南勢阿美族、阿美族的米亞灣人（Miyawan）、撒基拉雅族、哆囉滿人（Turuboan 或 Tarraboan）、猴猴族（Mak—qaolin）、Pabanangh、Dadanghs 與太魯閣族等，他們在國家統治力量進入後山之前，曾以自己的行為法則決定與周遭族群的和戰關係，就在優勝劣敗的競爭壓力下，部分族群消失了蹤影，或展開遷徙；而噶瑪蘭族人雖然來得最遲，但在取得與撒基拉雅族人的同盟關係之後，雄霸於奇萊平原之上，甚至使得鄰近的外太魯閣族社心生恐懼。<sup>11</sup>

接著要探討的是「清帝國統治的建立」。在這個章節中，筆者將探討清帝國國家力量進入的背景、「開山撫番」與統治機構的建立，以及探究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初接觸清帝國軍隊之後的反應。過去清帝國統治的範圍，主要在臺灣的西部平原，而到嘉慶 15 年（1810）之後，也把注意力轉到東北邊的噶瑪蘭地區，並在嘉慶 17 年（1812）正式設治，但是後山地區仍是在帝國的控制範圍之外，屬於不受國家支配的「化外之民」、「化外之地」。隨著日軍侵犯南臺灣之後，使清廷開始注意後山番地的經營，運用兵工以很短的時間進行「開山撫番」，並把統治力量推進到後山地區，建立統治機構，其中宣示主權的意味非常明顯。當清帝國官軍進入奇萊地區之後，使當地的原住民族群感受到生活空間被侵犯，因而與官軍屢屢出現緊張的場面，甚至發生零星的戰鬥。關於這些衝突，筆者將從文獻來還原初接觸清帝國時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。其中，較晚遷來後山奇萊地區的噶瑪蘭族，因為新仇加上舊恨，害怕在後山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園，再次受到侵擾及喪失土地，不斷試圖拉攏周遭的原住民族群，以反抗清帝國官軍。

第三章則是分析「『加禮宛社之役』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之消長」。在這個章節中，筆者將探究「加禮宛社之役」之緣起及經過、清帝國當局的善後措施、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之消長，以及清帝國割臺之前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概況。「加禮宛社之役」是清帝國統治後山初期，在後山北路重要的戰役。清廷在優勢的火力，及成功地運用「以番制番」的策略下，擊敗了抗清的噶瑪蘭人與撒基拉雅人。這場戰役使得噶瑪蘭人及撒基拉雅人在奇萊地區的勢力範圍崩解，南勢阿美的七腳川社則乘勢崛起，成為奇萊平原地區最強大的族社；而近山地區的太魯閣人，則在清人「以番制番」的策略下擴張了地盤。由於清帝國的後

<sup>11</sup> 楊南郡譯註，森丑之助原著，《生蕃行腳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2000），頁 429-430。

山經營並不積極，雖然曾在太魯閣族人活躍的區域內設置營壘、碉堡防禦攻擊，但因不敵瘴癘侵襲，及受到太魯閣族人不斷襲擊，最後竟完全棄守，以致晚清的奇萊地區北部，太魯閣族人一躍成爲最強大的族社。而隨著官方放棄了北路的據點，對太魯閣族人的軍事行動減少了，自然地對太魯閣族人的記載也變少了。

第四、五、六、七章，筆者將探究國家統治力量介入最徹底的日本帝國統治時期。

第四章將探討「日本帝國統治的建立」，其內容包括日治初期理蕃政策的演變，及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概況。在統治之初，由於臺灣各地漢人的抗日事件風起雲湧，使日本人忙於鎮壓、討伐，因此，多以懷柔的方式對待原住民族群，至於頑強的原住民族群，只能施以幾回試探性的征伐罷了。但隨著各地漢人的抗日事件大致平定之後，由於臺灣山地有豐富的自然資源，加上日本政府的統治威信不容許一再地受到挑戰，因此，擁槍最多的「兇蕃」，自然成爲圍剿的對象，而日本人更相信，只要制服太魯閣兇蕃，就能風靡全體泰雅族（Atayal）。而太魯閣族群又一再地反抗，因而早期日本在奇萊地區的統治，主要應付的對象爲太魯閣族人。而在日本當局的調查下，也發現奇萊地區各族群之間的相互關係，這項發現有利於之後「以蕃制蕃」政策的運用。

第五章即探究「日治初期統治當局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互動（1895-1914）」。首先探討太魯閣族群的抗日事件，與日本當局的對策；接著探討「七腳川社之役」的緣起與善後、「太魯閣之役」的登場。爲了對付太魯閣族人，日本當局除了以軍艦、軍隊、警察來砲擊及攻剿之外，也「以蕃制蕃」地徵召南勢阿美族人攻打太魯閣族人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日本當局設立國語傳習所太魯閣分教場、准許日本私人企業「賀田組」進入山地製腦，以及在古魯社設置警察官吏派出所等，希望藉此慢慢地將國家力量深入部落當中，但成效有限，甚至因爲採樟警備津貼發放糾紛，而引爆「威里事件」及「古魯社事件」，使得日、太關係陷入緊張。爲了達成封鎖太魯閣族人的目的，日本人在奇萊地區修築「隘勇線」，將南勢阿美的七腳川社推上理蕃的最前線，但卻意外地引爆了「七腳川社之役」（「七腳川事件」）。

七腳川社從清帝國統治以來，即是歸順度相當高的族社，並多次協助官方攻擊與政府對抗的族社。但是當他們與日本當局站在敵對的立場時，爲了樹立統治者的威信，因此，在主要敵人太魯閣族尚未平定之前，七腳川社即成爲日本當局欲去之而後快的「滅社」對象。而伴隨戰事的結束，七腳川社遭到滅社、遷社，南勢其餘各社槍枝遭到收繳，臺灣出現了第一個日本「官營移民村」—吉野村，而花蓮港廳也獨立設治。日本當局摧毀了反抗的七腳川社勢力之後，繼續對近山地區的太魯閣族展開另一階段的攻勢。在武力鎮壓太魯閣族之餘，日本當局也希

望透過招待蕃人赴日觀光的方式，使之震懾於日本帝國的偉大與軍隊的強盛，但因日本人的勢力一直無法深入太魯閣族的勢力範圍，因此，在赴日觀光的行列中見不到太魯閣族人的蹤影，因此，深入蕃地調查、限制物品供應及討伐，成了日本政府解決太魯閣族群最後的方法。完成各項準備工作之後，大正 3 年（1914），日人從東、西方向以警察及軍隊向太魯閣族人盤據的中央山地發動攻擊，甚至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親臨指揮作戰。最後在寡不敵眾及武力的劣勢之下，這場太、日的最後決戰，太魯閣族人終於屈服。

第六章探討「後『太魯閣之役』時期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統治政策之推移與影響（1915-1930）」，內容將分析「太魯閣之役」後日本當局的重要措施，與奇萊地區統治威權的完成，以及對平地原住民族群、太魯閣族群統治政策之推移與影響。「太魯閣之役」落幕之後，日本人進一步對太魯閣族群進行統治，而此時原本在「七腳川社之役」平定後仍不願投降，而躲在普拉腦（今重光部落）山地的七腳川社眾，也乞求歸順，使日本當局在後山的統治，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。日治時期，平地原住民族群因開化程度較高，歸入一般行政治理。而在七腳川社被平定之後，其餘南勢阿美各社更是臣服於日本帝國的統治，成為歸順度相當高的族社。在後太魯閣之役時期，對於平地的原住民族群，日本當局透過公學校教職員、警察等，進行各項部落改造政策與教化措施，對傳統的部落組織造成相當大的衝擊，使平地原住民族群更進一步接受國家力量的支配。

而對分佈在山地的太魯閣族群方面，則是強化國家的統治力量，包括興建山區的道路、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、蕃童教育所、療養所、建立佐久間神社、施行各項授產政策、蕃產教育所……等，以使太魯閣族群各部落的聯繫受到嚴密的監控，同時從心理及生活上試圖將其加以改造，使其成為不會反抗的蕃人。由於擔心其分佈在深山，不易監控及達成農民化的目的，加上為了完成山地資源開發的目的，因此，計畫性地逐年將太魯閣族，從山地遷徙到近山及平原地區（集團移住）。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，太魯閣族人傳統的行爲法則受到了限制，國家的統治力量下達到各個階層。

第七章則是探討「日治末期統治政策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歷史變遷（1931-1945）」，內容包括「霧社事件」後日本當局理蕃政策的推移，以及分析在「皇民化運動」、「太平洋戰爭」的時局變化下，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有何變遷及其因應之道。

昭和 5 年（1930）的「霧社事件」，對全臺灣各部落的理蕃政策帶來相當大的衝擊與改變，因此，在事件落幕的隔年（1931），總督府即頒佈《理蕃政策大綱》，以作為理蕃人員處理蕃地蕃人事務的依據。「霧社事件」之後，理蕃政策更加地積極，為了落實瞭解蕃地、蕃人，從總督府到地方的州、廳，都參與蕃地開

發的調查工作；而對於警察素質的提升，及教育擔任者的監督輔導，也更加地注意與強化。之前以勸誘為主、強制為撫的「集團移住」政策，也更加加速進行，以便對深山地區的原住民族群加以控制，而太魯閣族人大部分都被強迫遷徙，離開其傳統領域，同時大部分的蕃地都劃為官有地，或提供給企業家經營。

爲了拉攏青年人，完成對部落的控制與改造，青年團及各種自助團體紛紛出現在部落當中，也藉由各項獎勵措施籠絡原住民族，增加其榮譽感。而且爲了進一步使他們能爲國家效力，甚至是爲將來南進作準備，各項教化積極進行，包括從物質、精神、授產方面試圖改造原住民族，並將過去不雅的「生蕃」稱呼改成「高砂族」。

進入「皇民化運動」期間，日本當局更透過公學校教職員、警察、公務員等，加強對自助團體的運作與輔導，爲達成精神方面的教化，日本神社更大量地在部落中建立，神宮大麻也被推廣。由於語言將影響思考及認同，因此，「國語」（日語）普及成爲「皇民化運動」中的重點工作。爲了將強對平地阿美族的控制，原本運用於漢人的保甲制度，也應用於南勢阿美等阿美族人。進入「太平洋戰爭」之後，在當局、媒體、警察、公學校教職員及各種自助團體的運作之下，支援戰爭成了重要的工作，而藉由參與高砂義勇隊、志願兵及配合徵兵，使原住民族群與漢人同樣被捲入戰爭的漩渦中，而原住民族群爲什麼參加戰爭，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。

最後則是「結論」，對研究的成果作扼要的陳述，並提出研究論文重要的意義所在。因此，本研究所撰寫的章節如下：

## 緒論

### 第一章 奇萊地區的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群

#### 第一節 「奇萊」的界定與自然環境

#### 第二節 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

### 第二章 清帝國統治的建立

#### 第一節 國家統治機構的建立

#### 第二節 初接觸清帝國的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

### 第三章 「加禮宛社之役」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之消長

#### 第一節 戰事的爆發與清帝國的善後措施

#### 第二節 遷社問題的探討

#### 第三節 戰爭後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之消長

### 第四章 日本帝國統治的建立

#### 第一節 日治初期理蕃政策的演變



- 第二節 日治初期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概況
- 第五章 日治初期統治當局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互動（1895-1914）
- 第一節 太魯閣族群的抗日事件與統治當局的對策
- 第二節 「七腳川社之役」的緣起與善後
- 第三節 太、日最後的決戰—「太魯閣之役」的登場
- 第六章 後「太魯閣之役」時期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統治政策之推移與影響（1915-1930）
- 第一節 重要措施與奇萊地區統治威權的完成
- 第二節 平地原住民族群的統治政策與影響
- 第三節 太魯閣族群的統治政策與影響
- 第七章 日治末期統治政策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歷史變遷（1931-1945）
- 第一節 「霧社事件」後的理蕃政策
- 第二節 「皇民化運動」下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
- 第三節 「太平洋戰爭」下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
- 第八章 結論

### 三、 文獻評估與研究概況

#### （一） 文獻評估

清帝國時代，在「開山撫番」之前的文獻資料，主要是來自文人、官員的著作、奏摺、書信及地方志，但由於真正進入後山活動的只有少數的商販、探險家，以及為招諭生番而來的通事，因此，對奇萊地區的敘述非常的少，而且往往來自於傳說，因此，引用資料來分析國家勢力進入前的原住民族群關係與發展時，必須特別的小心。

而進入「開山撫番」之後，由於開路及設治，因此，對奇萊地區的敘述多了起來，包括羅大春《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》、沈葆楨《福建臺灣奏摺》、吳贊誠《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》、胡傳《臺東州采訪冊》與《臺灣日記與稟啓》、《申報》、《清穆宗實錄》、《清德宗實錄》、《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》、《臺灣通志》、劉銘傳《劉壯肅公奏議》、馬偕《臺灣六記》、連橫《臺灣通史》……等，雖然記錄不及臺灣西部豐富，但已簡單地勾勒出奇萊地區的自然與人文景象，及清帝國對後山原住民族群的統治政策、番亂發生時的處理方式。

到了日本帝國統治時期，為了殖民統治的順利推展及經濟開發，並豐富日本殖民母國的經濟，因此，積極地進行各項調查，因而也留下豐富的資料。而統治

的過程及理蕃政策、經過，更是記錄翔實。這個時期的文獻記錄相當多，包括田代安定《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》、《花蓮港地方巡視報告》、豐田龜萬太《新城及大鹿角附近巡視報告》（收於《花蓮港地方巡視報告》後半部）、鹿子木小五郎《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》、移川子之藏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》、森丑之助《臺灣蕃族志》、鳥居龍藏〈東部臺灣諸蕃に就て〉、馬淵東一〈研海地方に於ける先住民の話〉、日本臺灣守備第一混成旅團司令部編《臺灣史料》（二）、《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》、安倍明義《臺灣地名研究》、筒井太郎《東部臺灣案内》、渡邊善嗣《改隸前の東部臺灣》、檜崎冬花《太魯閣蕃討伐誌》、橋本白水《東臺灣》、《東臺灣研究叢書》、《理蕃誌稿》、《總督府公文類纂》、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、《蕃族慣習調查報告》、《臺灣蕃族慣習研究》、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、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、《臺灣教育沿革志》、《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》、《臺灣警察協會雜誌》、《臺灣警察時報》、《臺灣時報》、《理蕃の友》……等。但有時殖民統治者會將其征討行為合理化解釋，因此，在徵引時必須加以釐清，以便找出較接近真相的答案。

## （二） 研究概況

近人的研究中，直接針對奇萊地區所做的探討不多，有些只佔著作的一小部分，但都值得參考。

關於清帝國統治時期，康培德的論著《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—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》值得參考。該書中的〈異族建構〉與〈帝國邊陲〉兩章，屬於晚清時期的探討，主要分析南勢阿美在晚清時期的區域分佈與勢力範圍的變遷，<sup>12</sup>而有關統治政策以及山地的太魯閣族群的探究方面，則是可以再加以深入分析的。詹素娟的博士論文〈族群歷史與地域—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（從史前到 1900 年）〉，對噶瑪蘭族的遷移及「開山撫番」後的勢力消長，有不錯的分析，<sup>13</sup>值得肯定。而張世賢的《晚清的治臺政策（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二十一年）》，是在「牡丹社事件」的大環境變遷下，探討晚清的治臺政策，尤其是針對不同主政者的意見及統治手腕有獨到的分析，<sup>14</sup>但是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反應及勢力消長的部分，則比較欠缺深入的探究。

王慧芬的碩士論文〈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〉，對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演變有

<sup>12</sup> 康培德，《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—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》，頁 129-219。

<sup>13</sup> 詹素娟，〈族群、歷史與地域—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（從史前到 1900 年）〉（臺北：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8）。

<sup>14</sup> 張世賢，《晚清治臺政策（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二十一年）》，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之八十（臺北：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，1978）。

詳細的探討，但就比例上而言，乃以臺灣西部為主。<sup>15</sup>李宜憲的〈晚清後山駐兵初探〉、〈晚清後山駐軍與民庄的關聯性〉、〈晚清後山開撫議論之流變〉，則是從駐兵區、駐軍與民庄的關係，及開撫思想的轉變，來探討後山的歷史變遷，<sup>16</sup>是過去後山研究者較少注意的課題，值得參考。張永楨的碩士論文〈清季臺灣後山開發之研究〉，對漢人移墾及清帝國的統治著墨較多，並認為南、北二路之開闢，奠定了日後開闢蘇花公路與南迴公路之基礎，而且由於安撫原住民族，使後山成為漢人與原住民族共存共榮之地，奠定了日治時期及光復後經營後山之基礎。<sup>17</sup>事實上，這些基礎一直到日治時期才算建立，因為番界道路與日治時期的道路並不相同，而且清末的番界道路由於原住民族群的襲擊，及瘴癘之氣的緣故經常不通，要到日治時期積極的「理蕃」，深入部落的底層，才使得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得以順利地進行統治。

而筆者的《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》(由碩士論文改寫)、〈晚清「開山撫番」下奇萊平原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消長之研究〉，對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在晚清時期的歷史變遷作了分析；<sup>18</sup>近年來隨著資料的不斷解讀及翻譯，應該還有深入研析的空間。而孟祥瀚的碩士論文〈臺灣東部拓墾與發展(1874-1945)〉，則是從晚清時期跨越到日本統治時期，其對日治時期的著墨比晚清來得多，而對於原住民族群在統治政策下的變遷則比較欠缺，不過他對日治時期東臺灣研究的書目，提供給後來的研究者研究上的便利，可以根據其參考書目進行探究，及進一步的擴展。<sup>19</sup>

伊能嘉矩的《臺灣文化志》及《臺灣蕃政志》，在過去一直被視為經典而引用，但他對於「阿棉納納之役」、「加禮宛社之役」……等戰役，很可惜地並未參照當時清帝國官員的奏摺，而以傳說的資料進行分析、探究，<sup>20</sup>因此，在利用伊能嘉矩的資料時，務必特別小心。

進入日本帝國統治時期的研究，自日治時期以來即有不少的著作出現，但是

<sup>15</sup> 王慧芬，〈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〉(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0)。

<sup>16</sup> 李宜憲，〈晚清後山駐兵初探〉，《臺灣風物》50卷1期(板橋：臺灣風物雜誌社，2000)，頁13-42；李宜憲，〈晚清後山駐軍與民庄的關聯性〉，《臺灣風物》50卷3期(板橋：臺灣風物雜誌社，2000)，頁83-114；李宜憲，〈晚清開撫議論之流變〉，收入《臺灣風物》51卷1期(板橋：臺灣風物雜誌社，2001)，頁111-140。

<sup>17</sup> 張永楨，〈清季臺灣後山開發之研究〉(臺中：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5)。

<sup>18</sup> 潘繼道，〈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〉(板橋：稻鄉出版社，2001)；潘繼道，〈晚清「開山撫番」下奇萊平原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消長之研究〉，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，東臺灣研究會協辦，《國家與東臺灣區域發展史研討會論文資料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，2001)，頁85-122。

<sup>19</sup> 孟祥瀚，〈臺灣東部拓墾與發展(1874-1945)〉(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8)。

<sup>20</sup> 伊能嘉矩，《臺灣文化志》(東京：刀江書院，1928)；伊能嘉矩，《臺灣蕃政志》(臺灣：古亭書屋發行，祥生出版社出版，1973)。

直接切入奇萊地區的學術著作則比較少。

關於理蕃政策及相關研究方面，主要有藤崎濟之助《臺灣の蕃族》、鈴木作太郎《臺灣の蕃族研究》、井出季和太著《臺灣治績治》、藤井志津枝的博士論文〈日據前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〉、藤井志津枝《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—理蕃》（由其博士論文出版）、藤井志津枝《臺灣原住民史—政策篇》、鍾淑敏〈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—以吉野村為例〉、李文良的博士論文〈帝國的山林—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〉、蔡迪清的碩士論文〈集團移住與宗教變遷對部落環境行動之影響—以太魯閣族三棧部落為例〉、胡曉俠的碩士論文〈日據時期理蕃事業下的原住民集團移住之研究〉、張旭宜的碩士論文〈臺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〉、張素玠《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—以官營移民為中心》（由其博士論文出版）、林素珍〈日治時期阿美族的保甲制度〉、林素珍的博士論文〈日治後期的理蕃—傀儡與愚民的教化政策（1930-1945）〉……等。這些論著當中，關於山地原住民的統治政策推移、集團移住始末所作的探討相當多，相對的對於平地原住民族群部分的研究則相當少。

藤崎濟之助、鈴木作太郎的著作，整理過去臺灣整個原住民族的傳統習俗之外，也針對荷西時代以來的歷史作了完整的探討，並保存相當豐富的史料，而關於日治時代的理蕃政策更有翔實的介紹；<sup>21</sup>井出季和太的論著，則依照總督的順序，探究歷代總督的治績；<sup>22</sup>藤井志津枝的博士論文，針對佐久間及之前各個總督的理蕃政策作了詳盡的探討；<sup>23</sup>《政策篇》則對政策演變部分作了分析，但可惜地並未針對族群變遷部分作探究；<sup>24</sup>鍾淑敏則探討七腳川事件後的官營移民政策。<sup>25</sup>

李文良提到蕃地的拓殖政策依然必須經由與理蕃、林政間相互折衝而制訂，過去所謂的「理蕃政策」，就實際的內涵而言，其實只是在做「蕃人控制」研究，因此，他從總督府的山林經營政策進行檢討，探討日本當局山地政策的演變；<sup>26</sup>蔡迪清則以秀林鄉的「三棧」部落為例，看集團移住與宗教變遷對原住民部落面

<sup>21</sup> 藤崎濟之助，《臺灣の蕃族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88）；鈴木作太郎，《臺灣の蕃族研究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88）。

<sup>22</sup> 井出季和太，《臺灣治績志》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85）；郭輝編譯，井出季和太著，《日據下之臺政》，第1冊、第2冊、第3冊（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77）。

<sup>23</sup> 藤井志津枝，〈日據前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87）；藤井志津枝，《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—理蕃》（臺北：文英堂，1998）。

<sup>24</sup> 藤井志津枝，《臺灣原住民史—政策篇》（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2001）。

<sup>25</sup> 鍾淑敏，〈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—以吉野村為例〉，《史聯雜誌》8期（高雄：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，1986），頁74-85。

<sup>26</sup> 李文良，〈帝國的山林—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1）。

臨環境災害而採取行動時所造成的影響；<sup>27</sup>胡曉俠乃探究原住民族群的集團移住，如何在日本當局理蕃事業下的形成歷程，以及探究對於當時「理蕃」的意義，與不同「理蕃」方針下原住民族群集團移住的主要作法。<sup>28</sup>

張旭宜則從文化、社會的角度，探討原住民族出草習慣與總督府「禁首狩」理蕃政策間的文化角力過程，導致原住民族在失去傳統上勇敢、敬祖的文化表徵後，將此追求投注到日治末期的從軍熱潮上，它是藉由社會、文化的另一角度來解釋理蕃政策；<sup>29</sup>張素玠探討日治時期的移民村，其中探討了七腳川社與移民村建立的關係；<sup>30</sup>林素珍對阿美族「保甲制度」的探討，則是少數對平地原住民族群關懷的論文，她分析了日本統治政策對傳統阿美族社會組織的衝擊。<sup>31</sup>

林素珍的博士論文，則是企圖探究日本理蕃當局的決策面，和行政體系形成的過程，並從原住民族的角度切入，探討日治時期執行的政策，與原住民族對政策的回應。雖然其論文的斷限，是在「霧社事件」之後的日治末期（1930-1945），但實際上也回溯日治初期以來的統治政策變遷。其論文著重在教化問題的探討，而對於教化政策的屬性用「傀儡」與「愚民」來形容，若站在原住民族或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看，則是對統治者強力的批評。<sup>32</sup>

另外，探討日本當局統治政策對原住民族群土地財產權的衝擊方面，也有不錯的學術論文出現，包括吳樹欉的博士論文〈臺灣原住民族土地財產權制度變遷之研究—日治時期迄今從共同所有到個別所有的演變〉及陳獻明的碩士論文〈臺灣日據時期被強占土地問題之研究—從財產權保障觀點〉。吳樹欉剖析原住民族土地財產權制度，從共同所有到個別所有的演變關係；<sup>33</sup>陳獻明則以財產權保障的觀點，探討日治時期被日本政府強佔土地問題發生的背景、原因。<sup>34</sup>

而在區域開發史方面，有張家菁《一個城市的誕生—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》（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改寫而成）、黃玉翎的碩士論文〈花

<sup>27</sup> 蔡迪清，〈集團移住與宗教變遷對部落環境行動之影響—以太魯閣族三棧部落為例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9）。

<sup>28</sup> 胡曉俠，〈日據時期理蕃事業下的原住民集團移住之研究〉（中壢：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6）。

<sup>29</sup> 張旭宜，〈臺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5）。

<sup>30</sup> 張素玠，〈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—以官營移民為中心〉（新店：國史館，2001）。

<sup>31</sup> 林素珍，〈日治時期阿美族的保甲制度〉，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，東臺灣研究會協辦，《國家與東臺灣區域發展史研討會論文資料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，2001），頁 17-31。

<sup>32</sup> 林素珍，〈日治後期的理蕃—傀儡與愚民的教化政策（1930-1945）〉（臺南：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3）。

<sup>33</sup> 吳樹欉，〈臺灣原住民族土地財產權制度變遷之研究—日治時期迄今從共同所有到個別所有的演變〉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論文，2000）。

<sup>34</sup> 陳獻明，〈臺灣日據時期被強占土地問題之研究—從財產權保障觀點〉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論文，1998）。

東縱谷人口分佈的區域變遷〉、邱世宏的碩士論文〈花蓮地區人口遷移的時空變遷〉、山口政治的《東臺灣開發史—花蓮港とタロコ》等。

在張家菁的論文中，探討了統治政策與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；<sup>35</sup>黃玉翎則從長時間演變，看花東縱谷人口分佈的區域變遷，其對各時期人口統計相當用心，但由於過去行政區劃常常因政權更迭而改變（例如花蓮縣光復鄉是戰後由瑞穗、鳳林獨立出來。在日治時期，鄉內人口分別屬於瑞穗、鳳林兩區），而且在統計時並未下達村落的層級（街庄為最底下的層級），因此，利用人口統計表時須特別小心；另外，作者也把日本當局對後山的統治政策作了簡單的整理。<sup>36</sup>

邱世宏透過歷史文獻資料，探討花蓮地區人口遷移的時空變遷，他透過 Petersen 的遷移類型分類，將這些遷移現象依人與環境、政策、國家、社會結構關係，分類為原始性、政策性、政治性、自主性等四種遷移類型，分析其遷移機制、過程、移民特質、聚落型態及遷移規模狀況等，並比較、分析、整合花蓮人口遷移的變遷。<sup>37</sup>山口政治的著作，對東部族群的歷史，尤其太魯閣族的部分作了相當幅度的介紹，他蒐集了不少當時曾在花蓮地區服勤日本人的口述歷史，或訪問其後裔，其記錄很有參考價值，對還原部分情境很有幫助。<sup>38</sup>

以上這些關於日治時期的著作及論文，對於理蕃政策及其對原住民族生活的影響及歷史變遷，都提供了很好的參考資料。

另外，關於奇萊地區的考古發現，可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。這部分可參閱劉益昌〈再談臺灣北、東部地區的族群分佈〉、葉美珍〈花崗山文化之研究〉……等相關論文。而有關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遷徙與歷史變遷部分，可參考廖守臣〈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〉（上）（下）、李壬癸《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》、楊南郡譯註《生蕃行腳》、《探險臺灣》、《臺灣踏查日記》、劉斌雄《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》、李亦園《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》、潘繼道〈被遺忘的「奇萊」民族與其故事〉、〈認識「加禮宛」〉、〈「開山撫番」下的噶瑪蘭族悲歌—加禮宛社之役〉、〈日據前臺灣太魯閣族群的發展〉、〈淺談一九一四年「太魯閣之役」前的太魯閣族群發展〉、〈日據時期臺灣太魯閣族群的反抗血淚〉、陳俊男的碩士論文〈奇萊族（Sakizaya 人）的研究〉、胡政桂的碩士論文〈七腳川社（Cikasuan）的研究〉、李景崇與廖守臣的《阿美族歷史》……等，而《東臺灣研究》第 4 期—「族群歷史與空間研究專號」，<sup>39</sup>亦有相關的文章可供參考。

<sup>35</sup> 張家菁，《一個城市的誕生—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》（花蓮：花蓮縣立文化中心，1996）。

<sup>36</sup> 黃玉翎，〈花東縱谷人口分佈的區域變遷〉（花蓮：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）。

<sup>37</sup> 邱世宏，〈花蓮地區人口遷移的時空變遷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5）。

<sup>38</sup> 山口政治，《東臺灣開發史—花蓮港とタロコ》（東京：中日產經資訊株式會社，1999）。

<sup>39</sup> 夏黎明主編，《東臺灣研究》4 期（臺東：東臺灣研究會，1999）。

而《花蓮縣志（稿）》對於早期地方文獻保存所做的貢獻值得肯定，因為經由這些先賢及學者的整理，提供了資料找尋時的思考脈絡與方向。但因為已多年未再重修，加上新資料不斷出現，而其中又有前後論述錯亂或歧誤的地方，因此，引用時必須先加以考定，如此才不致一再傳抄錯誤的資料。

#### 四、 研究展望

近年來關於臺灣西部開發史的各项研究，有相當可觀的進展，但臺灣東部歷史的研究，則仍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，值得深入探索。而在漢人的開發史及日本人在日治時期的「殖產興業」之外，原住民族群的發展史，以及國家力量對其歷史所造成的變遷方面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。因此，筆者希望藉由本研究來關懷自己的鄉土，瞭解國家統治政策對原住民族群所產生的歷史變遷，並使得花蓮地區部分的歷史得以重建，進而補充臺灣開發史中東部地區部分的空白。

